

对西部的关注与忧思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金少萍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西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举足轻重。在党和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的历史与文化、西部经济的发展、西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这不仅仅受到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也倍受学者和学术界关注。

2005年7月26日至29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自治州首府景洪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和西双版纳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150余人,国内代表分别来自北京、陕西、湖北、上海、厦门、广东、四川、贵州、西藏、宁夏、山东、内蒙、安徽、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国外代表来自美国、泰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

在会议的学术交流和探讨中,学者们发言踊跃、气氛炽热,既有共识,也有争鸣。论题呈现基础理论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并重,既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也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表示了高度的关切,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改善、缓解出谋划策。还贯穿着多学科、多视角的交融,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为主体,还有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更为可贵的是还有诸多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科技史等自然科学学者的介入。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一一展现,会议讨论高潮迭起。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不少代表在论文和发言中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和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在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诸如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开发的主体与受益者的关系、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等问题,必须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愿望。即西部的开发,必须是西部少数民族的开发,而不是将外来的模式强加于他们。只有这样意义上的西部开发才能够促进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和利益。这些观点和共识是这次会议最有价值的闪光点,这既表现了学者对西部的关注与忧思,也充分体现了当代学者的责任和使命。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考察了西双版纳的勐伦植物园、满春曼傣族园、勐海巴拉哈尼族村寨等,被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热带雨林自然风光和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所打动、感染。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论文摘要123篇,选题广泛、内容丰富。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历史、经济、文化3个组的讨论为基础,并结合提交论文的主要内容,对其主要的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历史方面的论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政治史的研究。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历代朝廷的边地治策和开发以及边疆行政区划的变迁等进行了探讨和反思,指出其对于现代民族关系的调整和西部开发的借鉴意义。戴建国《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归明人的政策》指出:归明人原本是西南地区蕃属少数民族,宋朝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一方面用各种优厚条件招徕归明人,另一方面对归明人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对归明人任官、待遇订有一系列制度。宋政府对归明人既礼遇又控制的双重政策,是宋朝开拓周边地区,巩固边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宋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思想。马晓丽《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指出: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具有积极意义:“怀服”的思想基础是承认少数民族和华夏一样都是人,中原王朝应当积极接纳,予以安抚,不分夷夏,同等看待;对少数民族“怀服”的前提条件,是少数民族“归我声教”、“尽忠向化”,遵循“人臣之礼”、“志尚忠节”,永远忠诚于唐王朝;“怀服”的终极目的是使少数民族“能扞彼边陲”、“慎守封疆”、“永为汉藩。”王湘云《谈谈土司的承袭及其他——以云南武定那氏土司为例》一文围绕云南武定那氏土司的承袭问题,探讨了西南土司土官的存在和沿革、内部运作及其与外部的互动影响等现象。张丽剑《天宝战争及其影响》指出:在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中,天宝战争对双方影响甚巨,它成就了强大的南诏政权,同时加剧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试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的角度及南诏的自然优势等方面对天宝战争加以探讨,具体分析了每一次天宝战争的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天宝战争对唐朝和南诏的深刻影响及由此所引发的民族关系的变化。王巧玲《汉唐西部开发政策措施比较研究及现代价值》一文试从史科学角度,对汉唐两朝在西部开发活动中的政策措施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西部概念追溯、汉代西部开发主要政策措施、唐代西部开发主要政策措施、历史比较及现代价值诸方面探究,提出当今西部开发活动中应吸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张赟《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云南的经济开发及治策对比研究》一文,以清政府对云南的经济开发为切入点,在大量阅读档案、史料、方志的基础上,对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开发云南经济的各项策略和措施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云南,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开发云南经济的策略和具体措施,应客观评价清前期在云南经济开发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后期的失误,及其对云南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滕兰花《历史与记忆:从明代云南武侯祠看诸葛亮南征》指出:民间力量在认同国家的历史过程中,也在用自己地方性的视野去叙述着历史事件,也就是用传说或民间祭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历史的一种记忆。东汉时诸葛亮南征,给云南各地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记忆,各地的武侯祠庙就是一个例子。本文从云南各地武侯祠的地理分布状况入手,探讨民众的记忆与诸葛亮南征这段历史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分析诸葛亮南征路线以及历史功绩。李孝聪《对西南地区历史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结构的认识》一文,通过对西南各地历史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结构的认识和分析,认为:自古以来西南地区对于中原文化始终抱有认同感,尤其是在经济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西南地区经济向东倾斜的特征更加突出。这不仅与长江水道的利用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东部的处于强势地位的经济、政治控制力逐渐渗透到西南地区,而最先受到影响的必定是西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是这样的一个结合部,它将早期自然形成的中国西部高原文化与后期来自东部的平原文化整合在一块大的地域范围之中,呈现在历史进程中的就是西部的文化起源和面向东部的转移过程。许正文《唐代我国西部行政区划演变的基本特点》指出:唐代是我国西部地区开发的重要阶段,也是西部行政区划变化较大的时期。其行政区划演变的主要特点:一是州县的增置、省废、改隶和辖区的变化;二是州县名称的更改、治所的迁徙;三是羁縻府州县的设立。引起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变迁而导致的。深入研究这些变化并探讨发生这些变化的特点,对于西部区域史的研究无疑是有所助益的,对于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耿昇《法国 1895—1897 年间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对云南省的考察》指出:19 世纪末,西方殖民列强为了争夺亚洲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纷纷向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派出形形色色的考察团。1895—1897 年间,法国里昂商会共邀请其他 12 家

商会，对与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接壤的中国西南部的云、贵、川以及广西、广东和香港地区作了商务考察，并于 1898 年在法国里昂出版了《法国里昂商会中国商务考察团报告》。本书仅就该考察团对云南的考察成果略作介绍。其中主要涉及到了云南的进出口产品：矿物、鸦片、皮货、麝香、丝绸。该考察团还调查了缅甸与中国邻省、缅甸和印度支那的贸易关系。马玉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述略》指出：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严重。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开始重视边疆问题。国民政府要求边疆省份设置边政研究机关，聘请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作为政府参考。云南省于 1943 年成立了“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隶属于云南省民政厅。本文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开展的工作及开展的工作及调查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

其二、历史文献和档案问题研究。民族地区的历史文献和档案，对于民族历史问题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官修史书的重要补充。目前，历史文献和档案文书的保护和抢救十分迫切，有的已流失到国外，应在保护和抢救的基础上，加以充分利用。张新民《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论》一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详细勾勒了自宋元迄民国贵州地方志各阶段发展的具体情况。认为大量地方志乘的修纂，既体现了传统史学顽强保存文化记忆的历史性特征，同时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除了方志自身内部的发展理路外，行政理性力量的介入推动，地方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传统士大夫立言不朽的价值诉求，都促进了志乘事业的发展。作为地方性知识宝库的志书文本，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李杰《傣族创世史诗中的历史意识研究》指出：《傣族创世史诗》一书集中地体现了傣族的历史意识，其核心是神人交替的历史观。该书从天神创世说的角度，叙述了傣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傣族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等，赋予天神在宇宙形成、人类起源、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思想文化的发展等发面都具有主宰的力量。但值得探究的是天神又是以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作用的，天神不过是人的符号，人用天神这一象征，表现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论文着重探讨了人的行为何以会以神意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的文化学意义是什么？它在傣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潘朝霖《保护水书，打造贵州南部旅游文化新亮点》指出：水书——水族古文字、书籍的通称，被誉为水族的百科全书，内容博大精深。水书珍贵的文化价值、文物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已被专家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所认识，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及时对水书进行抢救保护，再进行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是贵州南部水族地区旅游文化开发中厚重而永恒的民族文化资源。韩中义《小经历史文献——〈纪事〉初探》指出：“小经”是我国回族等穆斯林采用阿拉伯字母体系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其字母本身不标示元音，而是通过音标符号来表示长短、复合元音，并且不标注声调。其用来拼写汉、东乡、撒拉等语，尤以拼回族使用的汉语较为广泛。该文字使用的分布范围包括甘肃、青海、宁夏、河南、云南、新疆、陕西、内蒙等地。用小经记载的历史文献极少，《纪事》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可从中追溯回族等穆斯林历史发展的脉络。

其三、语言文字、文学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历史上对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播、教育的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当今对于历史研究、强化民族意识、民族关系的发展方面仍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语言文字的生存危机四伏，对其传承应给予极大的关注。邓章应《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方案概说》一文，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民族文字方案的概况、类型分类、特点、影响等方面的探讨，指出：传教士创制的民族文字方案与汉语译音方案互为推动，二者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影响了中国后来创制的众多民族文字方案；传教士创制民族文字方案，是最早的中国民族语言系统调查，并且为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开辟了道路；有些文字方案涉及到一些跨境民族，境内境外形成相互影响。黄澄《论语言使用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以通海县兴蒙乡云南蒙古语为例》指出：云南通海兴蒙乡的蒙古语既与北方蒙古语、当地的彝语、白语、汉语等语言有联系，但又不同于这些语言，是一种经过长期发展

的独立的语言。云南蒙古语的形成和使用是为了生存、适应并坚定民族认同和维系民族感情，其他语言的兼用则是为了增进与周围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往来。就是这样合理地使用这些语言及理性的变迁和保留，使得兴蒙乡蒙古族既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发展下来，又能与其他民族美美与共，和谐相处。陈畅《中国边缘社会的少数民族语言——以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为实例》一文，认为应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待民族语言的问题，特别是不可忽视从少数民族本身的视点和行动来看待其语言变化的趋势。以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的语言为例，通过对处于占绝对优势的汉语和傣语的多重语言环境中的哈尼族语言的使用状况，以及哈尼族文化生活的调查，描述了哈尼语不断变化的同时，哈尼族通过其文化实践，使用本民族语言，维护其民族特性的实例。鲜于煌《白居易《蛮子朝》等诗与云南纳西族民族特色研究》指出：在唐代白居易的诗歌中，保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纳西族的史料。以白居易的《蛮子朝》、《骠国乐》等诗为例，详细分析了纳西族先民的民族特性，这对于探讨纳西族的产生、发展及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邹建达《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变迁》指出：一文主要以谭正璧先生所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资料，论述了先秦至明清各朝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先秦、两汉、三国、西晋时期、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多在北方，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东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则多在南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既是经济发展和政治中心的一种体现，同时也体现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中国文化教育中心随之东移南迁的事实。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之间往复变动，但重心逐步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高徽南《典雅的乐府与古朴的傣歌——试析《孔雀东南飞》和《娥并与桑洛》的差异及文化成因》指出：文学作品《孔雀东南飞》和《娥并与桑洛》尽管母题相同，但在人物性格、叙事表现手法等方面有明显不同，这与两部悲剧的民族文化土壤密切相关。

其四区域史、民族史、科技史研究。在区域史、民族史、科技史的探讨中，更关注的是研究的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创新。在潘汁《侗台语民族综述》指出：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从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广东等省区，到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甚至远至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几十个彼此之间有着广泛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这些民族的族源的主干可以上溯至中国远古时代的“百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过迁徙、分化，再与周边的其他民族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了当今侗台语民族跨省、跨国而居的格局。本文在描述侗台语民族的现状的同时，还试图探求其迁徙的路线和分化的时间。杨斌《云南历史：边疆研究的成就与危机》一文，对云南历史研究的现状作了概括分析，强调云南研究对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东南亚历史以及民族问题、边疆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对西南和云南这两个概念进行梳理；进而总结云南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边疆史和地方史研究的云南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倡导跨地区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全球性的视觉，对于边疆研究的作用，试图用这种方法探讨云南历史研究的新思路。方铁《谈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指出：历史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和开发有正面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易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也扩大了可用的文化资源，对建设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应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素材都可成为有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论文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大致内容和基本特点，提出一些研究、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具体建议。朱普选《青海历史文化的地域特色》指出：由于青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区位条件、历史发展背景等，使青海的民族文化显示出多元文化的特点，并成为中华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主要表现在农牧文化共存、多种宗教文化共生、多种制度文化共举、民族风俗文化迥异等几个方面。张力仁《河西走廊：历史时期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指出：河西走廊是西北多民族、多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持续发生。本文通过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发展过程、动因及机制的分析，认为异质文化因子的不断介入，使河西文化在变化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取得一致。文化交流与

整合是河西走廊区域文化多元而趋于统一的主要推动力。古永继《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及其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和迁徙特点》指出：秦汉两代数百年间，外来移民在西南边疆开发、疆域形成以及当地局势变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论文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及其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形成大姓势力和有关迁徙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许宪隆《晚清以来陕甘宁穆斯林家族问题研究》指出：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民族、宗教等原因，家族，特别是具有相应的政界、军界、商界和教育背景的家族，在西北社会中的权重明显地高于国内其它地区。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惯性现象，习惯势力的延续性在当今社会仍不可低估，成为西部大开发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研究晚清以来西北穆斯林社会的家族现象，因而也就具有了对历史上开发西北的总结和对当前西部开发的参考意义。本文以社会学、现代化理论为指导，选取了四个家族典型案例，并以这些家族的兴衰和文化嬗变为个案研究对象，以家庭观念、成员结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潜移默化，作为转型时期的甘宁青社会缩影，并力图进一步探讨家族势力对社区社会的客观影响，分析家族在西北社会发展中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讨论家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合理社会定位。李晓岑《云南传统镍白铜冶炼技术研究》指出：白铜器是云南历史上唯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传统金属产品，它很早就传入了西方国家。对云南白铜的研究涉及人类是否在云南首先使用镍金属，中国金属技术在西方的传播等重大问题，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它的起源、发展、对外贸易和冶炼技术等问题，虽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若干重要突破，但仍有大量悬而未决的课题。本文分析了古代使用镍白铜的文献记载，公布了最近发现的中国宋代白铜实物。在牟定县白铜厂村实地考察了云南近代白铜生产的方法。用金相显微镜分析了当地生产的白铜的金相组织，用扫描电镜分析了白铜的化学成分。并对云南民间使用白铜的民俗及云南镍白铜研究的前景作了探讨。张实《云南藏医历史与文化》指出：研究云南藏医的历史，对宏扬和发展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藏医学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田野调查，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多视角，对云南藏医的源流、藏医学的理论体系、藏传佛教与藏医的关系、云南藏医的现状分析、藏医医疗行为与文化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粗步构建云南藏医历史发展的脉络。

其五、法制问题研究。既有对历史上法制问题的探讨，也有对现代社会法制与经济发展、社会协调发展关系的思考。方慧、赵元信《略论明代云南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的变化》指出：明代在云南实施的刑法原则，与元代有很大不同，不再像元代对土官土司犯罪多为宽赦，而是与明代总的刑法原则相呼应，在云南采取“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加重了对云南土官土司和各少数民族危害封建国家犯罪行为的惩罚。而对其他非直接威胁损害封建国家的行为，则可放宽处理。同时，与明朝严法整饬吏治的刑法原则一致，朝廷也加强了对云南官吏（包括流官和土官）的管理。云南明代的刑罚制度，基本以内地法律规定的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为主，同时也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是执行本民族的习惯法。本文就这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论证，并指出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陈金全《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与西部农村经济开发》指出：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不仅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重要本土资源，而且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中制度构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要改变西部贫困落后状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特别要注意挖掘和发挥民族地区传统法文化的精神资源作用。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它需要有序与和谐的社会环境，而民族传统法文化包含的法治意识、守法习惯、和解与妥协精神、诚信与平等互利原则等等有利于构建公共秩序，有利于发挥人的才智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对传统法文化要进行具体分析，要注意发挥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的补充作用，尊重村规民约，尊重村民自治，尊重人的首创精神。

其六、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研究。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是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对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民族关系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徐黎丽《论民族意识对民族关系

的影响》一文，认为民族认同意识对民族关系具有正负面影响，其积极作用可以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消极作用则会阻碍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将民族认同意识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度”内。所谓“度”，就是民族认同意识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的分界线。要维持这个度，首先必须将民族认同意识过分强烈的民族成员与民族认同意识一般的民族成员分别开来；其次，确定这种过分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对本民族或本国家是否产生负面影响；再次，逐步消除对本民族和本国家产生负面影响的民族认同意识；最后，营造国家范围内民族平等团结的氛围。吴洪琳《十六国时期铁弗匈奴的民族心态》指出：铁弗匈奴是南匈奴的一支与鲜卑族混血的后代。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建立大夏政权之后，铁弗匈奴一方面其民族意识及民族自豪感增强，并刻意强调和凸显其民族特征，另一方面却又极其渴望被主流文化即汉族文化所认可，表现出了极其矛盾的心理状态。李富强《壮族认同论》指出：壮族自称繁多，语言不同，文化多样，但具有统一的族体认同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具体有其三个认同层次，即自称群体认同、壮族族体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并非相互对立与排斥，而是和谐共存，构成了壮族文化“和而不同”的格局。

经济方面的论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区域经济及其开发研究。无论是区域经济的开发研究，还是有关水资源、矿产资源方面的开发研究，都有一个合理、适度开发的问题，并且其开发要与当地的资源、环境、经济实力、民族关系等诸因素相联系。石硕《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中的民族问题》指出：长江上游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区域，民族繁多，支系复杂，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处于汉、藏和汉、彝交汇之边缘，民族关系较为敏感。本文对在长江上游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尤其是移民搬迁过程中所要遭遇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在该地兴建大型水电站，要充分考虑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承受力。姚伟钧《西部水利开发建设的历史启示》指出：自古以来，如何利用有限的河流资源，改造自然环境，兴修水利，在西部干旱地区垦荒、植树、改造沙漠、发展社会生产，一直是历朝历代所重视的问题。勤劳勇敢而又富有智慧的西部人民认识到防洪、治涝、灌溉、排水等水利建设可以提高抗御洪、涝、旱、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降低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程度，为工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所以他们兴修了一系列子孙万代受益的水利工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水经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史继忠《能源矿产资源与西部开发》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必须考虑能源矿产资源与西部开发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在西部开发中发挥能源矿产的优势，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后果。首先，资源开发要掌握一个“度”，不能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无限的开发。其次，要提高开发的科学含量，采取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资源，不能把资源“贱卖”。再有，在进行资源开发的时候，务必要有相应的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在开发能源矿产的同时，一定要考虑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否则在能源矿产开发的热潮过去之后，本地经济仍然又回到落后与萧条。张青瑶《清代太原盆地非商业性质镇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一文，着重对清代太原非商业性质镇的分布与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讨此类镇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文章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重视典型个案分析，努力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傅宏《近代贵州的几次开发》指出：贵州近代经历了三次大的开发，第一次是抗战期间“战时经济”的开发，第二次是“三线建设”期间以“备战”为主的开发，第三次是当今的西部大开发。这三次开发都给贵州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贵州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有必要对三次开发的利弊得失进行思考，以便在西部大开发中少走弯路。邓正琦、李碧宏《渝东南民族地区脱贫进程研究》指出：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重庆市民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脱贫历程、脱贫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渝东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具体对策。黄传坤《云南农业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出：农业工业化是指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机械化和化肥、农药的大量推广，使农业被进一步纳入工业化的大潮

中。本文分析了农业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从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角度,通过对定单农业的分析,探讨了云南的农业工业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张锦鹏《发展特色经济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经济关系调整》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切实解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差距大的问题。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可以使城市体系的经济扩散效应更好地被农村吸收,使农村的经济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在特色经济的联系和带动下,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互动,分化城乡分离的地理二元结构,形成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瞿云珍《弘扬普洱茶文化 促进西双版纳茶叶产业提升发展》一文,在对普洱茶的概念、茶文化的定义、普洱茶的功能作用及茶叶产业的发展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弘扬普洱茶文化,促进茶叶产业发展的建议。常虹《对西双版纳州农村少数民族青年外出务工的思考》一文,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村少数民族青年走出山寨,进城或出境务工进行了探讨分析,其既有“利”,也有“弊”,但“利”大于“弊”。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各职能部门要给予正确引导,在“利”与“弊”之间寻找一个较为恰当的平衡点,做到扬长避短。

其二、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寻求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决定着西部开发的成败及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朱士光《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问题》指出:当前在西北地区的开发中,各级政府应遵循科学发展观,更加积极地发挥主导作用,努力探求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协调推进,互促双赢的方略。为此中央与地方政府还当继续加强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监测预报,大力开展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的综合研究,建立用法律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规划来实施领导地方工作职能之机制。周琼《清代滇南瘴气与民族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一文,以文献记载较多的清代滇南地区的瘴气对地方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对清代滇南地区瘴气的分布、瘴域的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对引起地方民族生态环境变迁的各因素进行探析,论证民族生态环境的变迁是瘴域变迁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亦能对当代民族地方生态环境的适度开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鉴戒。顾霞《试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指出: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发展西部地区经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与保持社会稳定,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是代表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利益的表现。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出现一些不正确行为,使得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趋严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给予保护,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大经费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制度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加强法治等方面来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使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环境保护得以健康协调发展。

其三、金融财政问题研究。关注金融财政制度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也是西部开发中有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陈章喜《论我国西部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证券化运作》指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西部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证券化融资,是拓展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道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西部大开发进程中金融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其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对西部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证券化的特征、运作与实施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与论述。王金秀、万江陵《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制度设计》指出:在我国当前,完善中央对民族地区财政资金转移的制度安排,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的发展观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中央对民族地区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是采取叠床架屋方式形成的。这种由历史变迁而初步形成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制度,其总体结构具有复杂性,所采取的渐进性制度变迁路径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但由此形成的制度也延续了旧体制的弊端,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缺陷,针对此,本文提出加大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现行制度的构想。张天政《20世纪40年代宁夏回汉乡村金融与区域经济及社会变动》指出:20世纪40年代,宁夏地方当局开始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回汉乡村金融建设,且给予农村金融以较大力度的支持。该时期的

乡村金融种类较多，从贷款的用途来划分可分为农田水利贷款、土地改良贷款、植棉贷款、农业种植及推广贷款(含籽种等实物贷放)、农村副业及畜牧业贷款等。40年代的宁夏农村金融在客观上不仅打击了农村高利贷日益猖獗的现象，而且有益于回汉民众生活及确立宁夏农村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

文化方面的论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对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研究，既有宏观的思考、大原则的拟定，也有微观的探讨、个案的分析。特别关注的是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问题等。石奕龙《试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若干原则问题》指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问题是应用人类学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对具有相对观念和希望变迁主体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人类学来说，在进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开发时，有下述几个原则问题，如因地制宜；成本效益问题；变迁主体的文化自觉；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等，应予十分关注，以便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开发，向既有利于文化保护，又利于少数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来仪《关于保护性开发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思考》一文，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成功的开发个案说明：保护性开发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可以做到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应该根据传统文化的类型和功能进行开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保证其使用的后续性要求。最后还要通过法制手段有效遏制各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的现象。田敏《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原则性思考》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研究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应遵循下述原则，如真实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民族自愿原则、符合时代潮流原则、特色性原则、生态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民族的文化自觉原则等。正确把握这些原则，对民族文化的合理传承和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起国庆《谈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分布最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最丰富的地区。云南同时也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和流逝的重灾区，抢救和保护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文章阐述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提出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具体措施。施传刚《体验民族差别：永宁地区三个族群不同文化经历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对摩梭、纳西、汉等三个族群在过去几十年中各有特色的经历的叙述和比较分析，试图论证，多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和民族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特有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过程。不仅文化传统的改变必然滞后于社会变迁，而且在生态环境大致相同的条件下面临同样的社会变迁压力时，不同文化会呈现出特殊的适应性和变化轨迹，而作为文化载体的族群在体验社会变迁时的经历也就各不相同。段超《再论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建设》指出：文化生态是维系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当前民族文化资源受到破坏主要是由于文化生态受破坏所致，要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必须保护文化生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和建设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适应机制、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交流机制等方面的保护与建设。文化生态保护与建设要取得成效，应注意研究有关民族文化事像生成、发展、演变的规律，将文化生态建设与自然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同时要纠正文化保护问题上一些不正确观念和认识。柏贵喜《西南山地民族生态知识与生态环境保护》一文依据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文献等方面的资料，论述了西南山地民族保护生态环境的优秀文化传统。认为，西南山地民族拥有许多地方性生态知识和生态智慧；西南山地民族农耕文化不是对生态进行掠夺性开发，而是一种通过开发和补偿两种机制实现自我调适的文化系统；西南山地民族尚有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的文化行为。生态环境保护应重视对民族社区地方性生态知识和生态智慧的发掘与利用。韩香《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西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发展及变异趋势》指出：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变迁与转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风俗习惯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物质民俗的趋同和标准化，也相应引起其他民俗的

连锁反应；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意识增强，使得一些将要丢失的传统民族习俗开始复兴；民俗与旅游开发等进一步结合起来。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当前许多为保护及发展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所采取的措施与现实的民间生活相脱节，甚至流于一种人为造设的形式，还没有真正起到从根本上培植壮大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各民族对民俗文化的保护看法不一，民族上层文化精英与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不一；西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及保守的行为方式。针对上述西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存在的问题，试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及建议。彭振坤《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构想——构建中国武陵地区文化生态旅游经济走廊》指出：当人类普遍关注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今天，当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候，土家族所在的武陵地区也在寻求文化与经济的契合点，试图从中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就土家族所处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和土家族分布的特点，以及土家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存量看，开发利用土家族地区文化资源必须整体规划，分区域实施，应构建一个武陵地区文化生态旅游经济走廊。尹绍亭《中国人类学者数据库建设》指出：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是云南大学 211 工程民族学重点实验室之一，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进行中国人类学者数据库建设。此数据库的建设将为国内外学者了解研究中国人类学现状及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资料，也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窗口。杨甫旺、李云峰《面对现代化冲击与发展的金沙江河谷傣族传统文化——以云南大姚县高坪子村为例》指出：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和发展，傣族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产生了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要调适、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一是必须大力改革社会习俗，做到发扬良俗，变革陋俗；二是大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丰富民族文化自身内容，改变其传统文化的内在要素和外部条件，建立相应的民族文化适应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傣族传统文化适应当前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才能解决好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促进傣族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郑晓云《傣族的水文化、水环境与健康生活》指出：在傣族社会中，水环境和人们的健康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水环境的变化以及水环境的建设都与傣族的水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文化的因素在这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傣族水文化的认识不仅仅对于今天傣族地区整治水环境及保持人们的健康生活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提高人们对于文化与健康之间关系的认识。张跃、刘娴贤《怒族传统民居文化意义探究——以云南省贡山县丙中洛乡怒族村寨为例》指出：建筑文化不仅包含人们对建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认识，也包含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理解。生活在怒江大峡谷深处的怒族人以木为主要建筑材料，建成木楞房和木板房，并形成一整套对“木”的认识理念，赋予了木头房子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通过对怒族传统民居文化意义的探究，力图为了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寻到一条新径，既增强保护意识，培植文化资源，又加强对外宣传，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注入新的文化内涵。黄柏权《从生活到艺术——土家族民间工艺调查》指出：民间工艺从生活用品到艺术品的转变，这是民间工艺发展的趋势，这种转变也许是民间工艺获得新生的又一出路。文章通过对土家族地区传统工艺的田野调查，以土家族传统吊脚楼、织锦、刺绣、竹编、竹篾、陶器等民间工艺为实例，以人类学的视角描述和分析了这一转变过程。文章指出，由于民间传统工艺用途的改变，相应引起了原材料的改变，传统品种和图案的变化，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设计者与生产者的分离，生产地的迁移等。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社会经济基础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现代传媒和旅游业的影响、政府的引导、学者和文化人的介入、现代技术的应用、生态环境的变化等，是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金少萍《大理石工艺村的保护与开发》指出：大理石工艺是自然物产与人工技艺的巧妙结合，可谓天造人工，这是大理石制品珍奇价值所在。其加工工序中的设计和技艺都凝聚着白族人民的智慧，是白族人民利用自然资源丰富生活，造福于人类的杰出创造，是值得珍视和继承的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其工艺的保护与传承具有双重意义，物产资源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合而为一。在三文笔大理石工艺村筹建大理石工艺博物馆、倡导大理石制品的精加工、建立大理石工艺传习场等，都是一种选择，有助于其工艺的保护与传承。高力士《傣族“竜林”文化研究》指出：少数民族传统环保的经验，

比起今天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文明人”更能自觉地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协调，他们虽没有为保护生态环境颁布过连篇累牍的法令、法规，也没有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宣言，他们仅是通过传统习俗，自然崇拜和禁忌来保护森林，维持生态平衡。然而他们的这些不成文“习惯法”，似乎比现代化的“环境保护法”、“环卫警察”更有效，能为社会全体成员自觉地遵守。傣族的“竜林”崇拜就是典型的一例。李晓斌《云南弱势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分析》指出：文化传承是使云南弱势少数民族社会特性得以保持的一个重要因素。云南弱势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传统精神文化对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的影响、传统精神文化对文化传承方式的影响、传统精神文化对文化传承特点形成的影响。本文从上述观点出发，就云南弱势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和分析。木基元《论独克宗古城的保护与香格里拉品牌的提升壮大》指出：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是2002年1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本文在叙述了独克宗古城的形成历史和独特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克宗古城的保护原则：历史文化名城的立法是首要的基础；科学规划是实施保护的前提；严格保护是永葆名城魅力的关键；发展利用是名城保护的出路。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和壮大香格里拉品牌。关传友《云南地区的民族竹文化》指出：云南省是我国竹类资源和竹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云南民族竹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两方面。就物质文化而言，竹在云南各民族人民的衣食住行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精神文化方面，竹对云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玉腊《傣泰民族服饰的多彩容颜》指出：中国傣族和泰国泰族是酷爱美并善于创造美的民族，服饰艺术多姿多彩。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并参考多种文献资料，对中国云南傣族和泰国泰族服饰的主要类型、特点、文化意义和民俗、艺术价值进行介说，从中可以看出从云南到中南半岛地区傣泰民族服饰文化的丰富、灿烂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异同。朱映占、吕昭义《一个依傍公路兴起的少数民族村寨的变迁——关于西双版纳景洪市基诺族乡巴卡小寨的田野调查》一文描述了基诺族巴卡小寨相关的历史和近年的变迁，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当传统的生产方式因生态环境、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共同作用而发生改变时，新的适应方式、新的节庆、仪式便被建构出来，巴卡小寨正在进行着文化的再建构。

其二、民族宗教研究。西部地区民族众多，其宗教文化也显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特别是外来宗教与当地民间宗教的碰撞与融合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吕建福《西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地位和作用》指出：西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具有多元性、多重性、民族性的基本特点，多元性表现在所信奉的不同宗教和地域分布，多重性则表现在单一的宗教和多重信仰并存以及不同的文化类型，而民族性表现在宗教文化与民族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一定的特点。并且宗教文化在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在西北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文化中曾起过主导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宗教文化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宗教最主要的功能是凝聚功能，通过宗教信仰维系本族的血缘或地缘关系；二是宗教文化在少数民族社会中起着社会整合作用，如同凝聚社会的“粘合剂”一样，具有结成社会整体并使之稳定和维持的作用；三是宗教文化仍然发挥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张泽洪《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与道教——以地方志资料的历史民族学考察》一文，主要利用地方志中的史料，探讨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并注意到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科仪文书中，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甚至在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文献中，都不乏道教思想影响的记载。可以说道教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融摄，构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邹志伟、曹志红《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及变迁》指出：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基础，藏传佛教对历史时期中国藏区（藏族聚居地区的总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诸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以寺院为基础的，与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又密不可分。当代的藏传佛教文化现象大都根植于历史时期，不了解历史时期藏传佛教时空变迁

的状况,也就很难准确把握当今藏传佛教的区域特征。因此,研究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及变迁,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当今藏传佛教问题的来龙去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立明、曹晓燕《藏传佛教在门隅的传播及其对门巴族社会的影响》一文试从藏传佛教在门隅传播的历史、达旺寺的扩建与政教合一制在门隅的确立、藏传佛教对门巴族社会的影响、门巴族藏传佛教信仰的特点等几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在门隅的传播及其对门巴族社会的影响。蔡华《道教影响下的彝族撒梅人西波宗教信仰之研究》一文,分析了道教传入彝族撒梅人中的历史背景及道教影响下彝族撒梅人西波宗教的斋醮仪式、经文和神灵系统,进而论证了西波宗教是在彝族民间宗教基础上融合道教的经文、斋醮仪式、神灵系统而形成的彝族撒梅人的民间宗教。龚锐《反悖中的交融——西双版纳傣族南传佛教与原始宗教在宗教仪式过程中的并存互通现象研究》一文,以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传播过程中与当地原始宗教从抗争、对立走向融合与互动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宗教世俗化的另类现象。段观宋《西南少数民族灵魂象征物的文化解析》指出:所谓灵魂象征物,是指人魂和物魂的物质表征,即灵像、灵偶、鬼偶等。试从文化的角度解析灵魂象征物,其一它是原始初民深层心理机制自然化的结果。其二、它是西南各民族人生哲理的外化。总之,灵魂象征物完成了对宗教观念、历史文化和人生哲理的多重强化,实现了从自然意义向人文意义的演进。杨宝康、苏汉林、张宏斌《佤族的自然崇拜与生态保护》指出:佤族的自然崇拜及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物的祭祀、禁忌活动,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观,维持了佤族地区的生态平衡,而且在自然崇拜基础上形成的习惯法对生态保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构建佤族现代生态伦理观时,要弘扬佤族自然崇拜中积极保护生态的观念和习俗,并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知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何作庆《哈尼族丧葬习俗中的人际关系探讨》一文在实际调查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梳理了红河流域哈尼族不同人生阶段丧葬习俗礼仪现状,分析了哈尼族人生阶段丧葬习俗礼仪中的二元多维多类的人际关系,探讨了哈尼族丧葬习俗礼仪中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构建哈尼族和谐社区的人际关系对策。

其三、民族教育研究。发展民族教育,应注意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长期性、自主性等方面。王欣《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与途径选择》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市场化日益充分的情况下,西北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何适应这种新的形式,摆脱旧有的发展模式,建立一种国家和地方互动、激活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良性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具体建议:第一,国家和西北民族地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大开发不可能一蹴而就,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更是如此。第二,没有国家和政府的适当投入,民族教育的发展就犹如无源之水,而如果没有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民族教育的发展就缺乏基本的原动力。第三,全社会应当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认识和发展西北少数民族教育,这是从理论上认识和解决西北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深化民族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之一,对于实现民族教育创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杨枝旺《关注傣族男童教育》指出:西双版纳的傣族男童面临着代表民族社会文化影响的佛寺教育、富含民族特色的傣族家庭教育、肩负提高民族素质神圣使命的国家基础教育三种教育。如何协调三种教育的关系,使国家基础教育深入人心,真正为提高傣族民族素质服务,傣族男童如何抉择,仍然是摆在民族教育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通过分析傣族男童所面临的三种教育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三种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呼吁社会和地方政府切实关注傣族男童教育问题。襄桂梅《西双版纳开发与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体系建设的构想》指出:西双版纳有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西双版纳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建构要立足当地。一是当地的文化传统;二是当地的现实。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建构和教材内容的选择要与西双版纳的经济生产、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医疗卫生相联系。真正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生活实际相联系;真正做到教育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真正做到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科学发展。聂曲、王军健、高徽南《科研——边疆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原动力——以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一文,以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从学院的改革发展需要科研引路、教育质

量的提高需要科研支持、教师的成才潜力需要科研激活等三个方面分析证明了科研是边疆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原动力这一论断。

其四、民族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兴起，为经济的发展、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个舞台，寻求旅游业开发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并及时总结旅游业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利弊得失至关重要。龚妮丽《贵州“民族风情”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指出：贵州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一是自然山水，二是民族风情，二者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特色，成为贵州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本。旅游资源开发与其他自然资源开发一样，有必要强调在开发中恰到好处地掌握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度”。以经济维度对旅游资源进行量的测评固然重要，然而以文化维度开展质的测评当有更深远的意义。王超《试论西安回族民俗与宗教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一文，以回族的民俗、宗教文化为主线，重点探讨其民俗、宗教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开发回族民俗、宗教文化为旅游业发展服务问题。同时把西安城市建设、旧城改造与西安回族民俗、宗教文化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为西安的建设事业提议献策。杨晓坚《云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特色问题探讨》一文，总结了以大理、丽江为代表的云南特色文化旅游开发的经验，肯定了现代经济运作方式与地方文化资源的整合既是少数民族地区融入现代社会的历程，又是地方旅游发展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云南拥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优势，却缺乏一种能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的指导性思路。应该跳出就旅游谈旅游的窠臼，从整体发展的高度看待旅游发展。并从对文化旅游纯商业消费的定位中超脱出来，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应该调整好开发中只顾眼前利益和好大喜功的功利心态，在一定的战略框架下把握文化旅游开发的特色和发展问题。

总之，正如吕昭义教授代表大会组委会作的大会总结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是一次参与广泛、多学科汇集、内容丰富、主题集中，理论研讨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并重的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既是一次关于西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汇萃，又是一次促进和推动学术研究的新的探索和开拓；既是学术盛会，也是一次将学术成果结合中国西部这片广袤的土地，实现中国西部各民族发展繁荣的行动。

Attention and Worries on the West Areas- A Surve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ulture in Ethnic Minorities Areas of West China

Jin shaop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 Borderland's Ethnic Minor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收稿日期：2005-10-28

作者简介：金少萍(1957-)，女，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冰贝)